

财新图书
Cairn Books

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

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Ronald H. Coase) (Ning Wang)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 王宁 著

徐尧 李哲民 译

RONALD H.
COASE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变革中国

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Ronald H.Coase)

(Ning Wang)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著

徐尧 李哲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 (英) 科斯, 王宁著; 徐尧, 李哲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86-3510-1

I. ①变… II. ①科… ②王… ③徐… ④李…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5160号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著者: [英]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译者: 徐尧 李哲民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94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3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3510-1 / F·2715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在 2008 年 7 月召开的中国经济转型芝加哥研讨会上，张五常教授发言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堪称“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①张五常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同样令人称奇的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事件并非有目的的人为计划，其结果完全出人意料。或许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是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佳案例。^②

1982 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张五常教授的一本小册子，其中，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向市场经济”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的这一回答表示彻底的怀疑。即便张五常本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十分审慎，他认为“这个转型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个想法合乎情理。经过极“左”教条多年的影响，中国人民对市场经济理应深恶痛绝。此外，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市场经济转型很可能会遭到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害怕自身的利益会受到威胁。4 年之后，即 1986 年，张五常的小册子再版，在该版中

① 张五常（2008），第 2 页。目前中英两版均已出版（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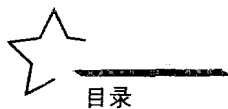
② Hayek（1967），第六章。

他对之前的观点作了调整，他承认“低估了转型的速度”，同时推断“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会明显低于前5年的速度”。然而，实际上转型的速度越发加快。极“左”教条对普通中国民众的影响并不那么明显，官员的反对也没有张五常所想的那么强烈。中国的确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本书中，我们将详细追述带来这一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其中的来龙去脉。

面对如此复杂的课题，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还有很多故事不为人知。此外，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随着新事实的出现，我们必然要在细节上对本书作修正。但书中呈现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大致脉络是清晰的，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本书中，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及对此的解读是由王宁最先提供的。在对事件重要性及相关性的讨论、纠正错误及矫正论点的过程中，两位作者通力合作。本书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我们所有的论据都是基于从各种采访及大量中外文献所获取的信息，在本书的脚注及参考文献中可找到对应的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解读可能与现有文献的记载和观点有所区别，在对许多重要事件的解析上我们自信做到了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关中国改革的中英文文献数量庞大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为了保证叙述直白，我们在行文中甚少直接牵涉有关文献。接下来为各位展现的，便是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国之路的一己之见。



序 / V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 1

第二章 中国在转折年代 / 33

第三章 中国市场体制改革起源 / 61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 99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 141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 203

后记 / 267

致谢 / 271

参考文献 / 273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世长辞。当时，中国仍在“文化大革命”之中煎熬。“文化大革命”^①是毛泽东于1966年发起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旨在为社会主义重新注入活力，摆脱腐败，消除官僚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的眼里，这只是他所主张的“继续革命”的开篇。^②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毛泽东着手推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开始的。毛泽东坚信，只要中国人民能将思想和行动

①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为塑造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骇人的努力。与其他政策灾难一样，“文革”也是中国政治的敏感话题之一，相关的政府档案数据仍属机密，绝大多数学者都无法获得。相关文献可参见王年一（1989）、Esherick et al (eds, 2006), 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及郭德宏等人编写的著作（2009，第三卷）。大多数历史资料都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即几乎都没有受害者本人的叙述。据保守估计，“文革”造成的伤亡人数达107万，参见陈永发（2001），第846页。对此，王友琴教授做出了勇敢的努力，她收集了659位受害者的悲惨故事，并结集成册，填补了这个空白。关于同一方面的早期尝试，参见冯骥才（1990）。Andrew Waldar（2009）亦对“文革”最为暴力和残酷的时期（1966~1968）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观点。

② 毛泽东为何会在中国刚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情况下又马上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到目前都仍无定论的一个问题。显然，权力斗争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是刘少奇在1959年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毛泽东对他的不满日益加剧。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在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狂热，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此外，毛泽东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这强烈表明权力斗争并非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

结合起来，把智慧和热忱投入到集体建设中，中国必定能够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昂首前进。^①中国人民将在无私和无产中获得重生。没有了历史包袱和封建制度的束缚，没有了物质利益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诱惑，中国人民将义无反顾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事与愿违，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运动深受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经不起推敲和检验。中国不但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它所继承的千年文化传统也被无情地切断，现代化进程陷入绝境。^②原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中国人民迅速沦为社会主义机器中无生气的螺丝钉。

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不幸令人扼腕，然而，他也为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朽功绩。《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归根结底，毛泽东毋庸置疑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成功者：他敢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战略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取得了政权；他引导了中国的社会变革，使中国从一个被战乱和贪腐蹂躏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统一的人人平等的、没有饥荒的国度；他让中国重新找回了民族骄傲感和自信心，用他本人的话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尽管这篇文章对中国饥荒的报道严重失误，^③但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否定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激励和影响。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大门被重新开启，他赞誉毛泽东为“一代伟大革命领袖中独一无二的人”。巴基斯坦前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毛泽东生前会

^① “金光大道”原本是作家浩然一部小说的名字，后来被广泛使用。该小说共四部，内容是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转型的称颂。

^② 关于该大饥荒的最新文献，参见杨继绳(2008)及Dikötter(2010)。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反传统和反智政治运动达到顶峰，大学被关闭，大多数书籍被禁甚至被烧毁。关于中国近代反传统主义的早期根源，参见林毓生(1979)。

^③ “毛泽东逝世”(Mao is Dead)，《经济学人》(1976年9月11日)。

见的最后一位外国政治家，^①他评价毛泽东为“革命的儿子，代表了革命的精髓，无疑谱写了革命的旋律和传奇，他所建立的无与伦比的新秩序撼动了世界，他是至高无上的缔造者”。他还补充道：“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一百年才出一个。”^②

带着充满矛盾的历史遗产，中国开始了后毛泽东时代的漫漫征程，没有任何蓝图在手，也不知何处是目的地。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耀眼的市场经济下庆祝它的60岁华诞。毛泽东的经济遗产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除非我们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整体把握，否则我们恐怕无法理解毛泽东之后中国经济让人难以置信的转变，无法理解在这60年中，中国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更令人好奇的是，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绝不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第一次调整。早在1958年，毛泽东便亲自发起过一场大胆的分权运动，期望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束缚。^③但这次尝试最终湮没在了“大跃进”（1958~1961）的灾难中。经过短暂的休养生息，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试图调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④然而，这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未竟事业的延续。1985年3月28日，日本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到访中国。邓小平在会见代表团时介绍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情况，并首次将这次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⑤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领导了中国第一次革命，由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

① 《纽约时报》（1976年9月10日）第一版，第17页。

② 《世界新闻文摘》（1976年9月11日），可通过LexisNexis获取相关信息。

③ 吴敬琏（2005），第46~49页；胡鞍钢（2008），第244~253页。

④ 胡鞍钢（2008），第512~515页。

⑤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Harry Harding（1987）也采用这一说法作为其书名。

被广泛赞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此后的许多场合中他都重复提到了“第二次革命”，这个说法后来也成为叙述经济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官方术语。第一次革命成功地重新统一了饱经战乱和动荡超过百年之久的中国。但如果说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完成前次革命的未竟之业，那毛泽东究竟留下了什么遗志未完成呢？又是什么阻碍了毛泽东完成他的宏愿呢？第一次革命有什么缺点和局限是邓小平必须克服的呢？

一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其独特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国上下一时沉浸于一片喜悦和欢腾之中。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胡风当时正从香港回到内地不久，他专门写了一首长达4000多行的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来庆祝祖国这一历史性的时刻。^①1911年，清朝退出历史舞台，结束了一段冗长的屈辱史，但中国并没有因此得以喘息。随后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及三年血雨腥风的内战，已让中国大伤元气，体无完肤。在经历了这一切磨难之后，中国终于再次统一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饱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国人民急切渴望着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回归。

不幸的是，中国重建家园的路走得崎岖而坎坷。和许多其他在“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一样，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毋庸置疑，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立。从意识形态上而言，那时的中国共产

^① 该诗第一部分“欢乐颂”刊载于1949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

党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追随者。^①

最初，莫斯科一直倾向于由孙中山于1919年建立的中国国民党——一个有丰富经验、组织庞大的革命政党，同时还敦促中国的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信奉联俄联共，毫无保留地接纳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蒋介石接替了他的位置。在联俄联共问题上，蒋介石的热情远不如他的前任。此前一年，蒋介石曾造访莫斯科，并用了三个月时间学习苏维埃制度，其间他还会见了里昂·托洛茨基及其他一些苏联领导人。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②192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地位得到巩固，随后他便与共产党决裂。一年后，他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时，莫斯科决定出面，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追随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组织城市起义。然而，此时中国的各大城市都由国民政府军重兵把守，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暴动无异于飞蛾扑火。共产党的势力仅在少数几个苏维埃根据地中存活了下来。这些根据地由共产党的民兵组织控制着，零散地分布在国民党军队难以触及的偏远山区。1934年10月，共产党失去了一个规模最大、存活时间最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处于江西，当时领导者为奥托·布劳恩。奥托·布劳恩有着一个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名字——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

① 中国共产党早期依靠共产国际的资助，后者试图获取其行动指挥权，这让中国共产党感到不安。两者的关系由于国民党的存在而变得更为复杂。关于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三者间的关系，参见Garver (1988)、Heinzig (1998)、杨奎松 (1999) 及邢和明 (2009)。

② 蒋介石于1923年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虽然他未能获得莫斯科方面直接的军事支持，但此次出访对他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蒋介石对苏维埃式的做法持矛盾的态度。但是，与孙中山相比，蒋介石显然并不看好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合作。关于蒋介石此次出访的近期文献，参见王荣祖和李敖 (2004)，第92~94页；杨天石 (2008)，第94~145页；Pakula (2009)，第122~124页；Taylor (2009)，第41~45页；以及邢和明 (2009)，第12~25页。在回忆录中，蒋介石 (1956) 更加渲染和夸大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批评。

的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拥有指挥权。^①根据地的失守迫使这群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不得不转移。次年，他们开始踏上一段横跨中国南北、漫长而又艰险的征途。他们穿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穿过了被满怀敌意的少数民族及地方军阀控制的地区，甚至还穿过了许多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雪山和沼泽地。1935年10月，他们到达陕西，结束了这段生存之旅，不久，毛泽东将这次转移称为“长征”。^②一年后，另外两支共产党部队与毛泽东顺利会师。随后，他们在陕西北部一个破旧而干旱的古城——延安——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由此直到1948年，延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③也是当时许多中国进步学生青年及西方中国支持者心中的一盏明灯。长征伊始，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李德因为错误的军事路线被撤职，而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对军队的指挥权，从此确立。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受莫斯科青睐。由于毛泽东常年在延安的窑洞中指挥中国革命，斯大林嘲讽他为“洞穴中的马克思主义者”。^④

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本土化的独立于莫斯科的中国政党。^⑤毛泽东极少正面挑战莫斯科，但随着他手中政权的壮大，共产国际方面再不能颐指气使地随意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长征消耗了中国共产党90%的军事力量，也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矢志不渝的中坚战士。长

① Otto Braun(1982)。书中描述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在中国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② 参见毛泽东于1936年12月27日发表的演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文选》第一卷，第179页。

③ Edgar Snow(1937)最为西方读者熟悉。该书多年来经过数次校订，增添了一些章节。

④ 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斯大林早期对毛泽东的诋毁在众多文献中都有记载。例如，Sergey Radchenko(2009)，第5页；也可参见杨奎松(1999)。

⑤ 关于长征的近期资料，参见孙书云(2006)。

征的幸存者是一支品质坚毅、意志顽强、士气高涨的精华队伍。^①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北方获得了更开阔广大的生存空间。与他们在长征前所奋战过的南方山区不同，中国的大西北为共产党提供了更宽广的平台来对抗蒋介石。驻扎延安之后，共产党立即招兵买马，扩大革命队伍。同时，由于临近北边的国界线，他们也能与莫斯科建立安全的通信及支援线路。而且北方军阀势力强大，限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日寇入侵中国后，南京政府被迫全面抗战。但时不我与，国民党屡战屡败，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这给常年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其得以在军事和政治上迅速成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很快发现，他的老对手早已不能同日而语，而对方对内战的准备也比自己充分得多。三年后，蒋介石败退台湾岛，将中国大陆拱手让给了毛泽东。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此后，斯大林却无法再忽视毛泽东，莫斯科也不能继续挑拨共产党和国民党而牟渔翁之利。1949年12月中旬，共和国成立刚过两个月，毛泽东匆匆出访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会晤斯大林。^②在此前的漫长革命岁月里，斯大林在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并拒绝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随着内战接近尾声，面对国内被战火蹂躏得残败不堪的经济状况以及冷漠无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政治和军事同盟。这是毛泽东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但莫斯科似乎不为所动。尽管斯大林以歉意的姿

^①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领导权的巩固的权威资料，参见高华（2000）。关于“延安道路”（Yan'an Way）的崛起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性的影响，参见Mark Selden（1971，1995）及陈永发（1990）。

^②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到访莫斯科及与斯大林的会面，参见Radchenko（2009），第3~9页。中文资料可参见逢先知和金冲及（2003），第28~58页。

态与毛泽东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毛泽东不得不在寒冷刺骨的莫斯科滞留了两个月，说服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同盟关系。后来，斯大林最终松口。1950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立即凯旋归国。他不可能想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条约却会把中国捆绑在斯大林主义的樊篱之上。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毛泽东的建国之路一波三折。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困境，中国却一步步深陷计划经济和激进意识形态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些不可言喻的苦楚和无助的挣扎将伴随毛泽东的余生。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有着纪律严明而专注奉献的政风以及混合经济强有力的帮助，社会秩序在短短的三年时间（1949~1952）便迅速恢复。其间，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农村社会掀起了阶级斗争的狂潮。尽管此次土改运动猛烈而又充满血腥，但中国的经济仍然在稳健地复苏。随后，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一五”计划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为原型，并得到莫斯科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①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虽然生硬，但能以行政手段调动大量资源，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集体化把农民绑在土地上，工人和单位也被捆到了一起。战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不久，中央计划的缺陷暴露无遗。虽然社会主义高举人人平等的旗帜，中国社会却是金字塔结构。身处金字塔底部的百姓缺乏激励机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泊；而高居塔顶的领袖深受信息不对称之苦，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问责机制的约束。整个中国政府正在学习打造一个全新又包罗万象的“新社会”，错误不可避免。

然而，正如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没有完全抹平毛泽东时代所打下的经济烙印。以此为出发点，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拉开了序幕。

^①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部分是所谓的“156项工程”——156个由苏联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项目，被誉为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奠基石”。例如，董志凯和吴江（2004）。

对许多学者而言，如何评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①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全盘推翻毛泽东的遗产，而另起炉灶。例如，一位作者将毛泽东之后的改革称为“大逆转”。^②值得称道的是，一些研究修正了这个观点，并揭示了毛泽东时代经济与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之间隐藏的延续性，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承认。^③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取得的经济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承诺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还在思考权力交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此时的中国，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曾经坚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已经变得模糊，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社会已经从内部枯萎了。尽管所有人看上去无动于衷地活在惰性和冷漠之中，但他们的内心早已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即使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一定期盼着能听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最有思想的人不禁自问：“如果这个新中国并不是我们和战友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中国该何去何从？”

① 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文献汗牛充栋，并且仍在快速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了解这一事实，可从由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Fairbank (1987, 1991) 编著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的最后两章入手。Maurice Meisner (1999) 及 Jack Gray (1990, 2006) 也是历史学家们最为推崇的资料文献。关于 1949 年以来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资料，参见 Chris Bramall (2009)。Barry Naughton (2007) 也提供了相当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丰富资料，尽管其着墨点在于改革时期。更为早期的资料，参见 Karl Riskin (1987)。中文文献方面，林蕴晖、范守信与张弓 (1989)，丛进 (1989) 及王年一 (1989) 的三部系列著作也是很好的入手资料。更为综合性的资料，参见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81)》，共 10 部。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的前三部 (共五部) 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相对客观和集中的叙述。关于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史实资料，参见孙健 (1992)、武力 (1999)、苏少之 (2002) 及胡鞍钢 (2008)。最为综合全面的资料可参见赵德馨 (1988~1999) 主编的五部系列著作。也可参见王宁 (2008) 对毛泽东时代经济的评价。

② William Hinton (1990)。

③ 例如，Meiner (1999)、胡鞍钢 (2008)、Bramall (2009)。